

魯迅正傳

鄭學稼著



勝利出版社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

魯迅正傳

每冊定價國幣 元

(外埠酌加運郵費)

著 者 鄭 學 稼

發 行 者 印 南 峯

發 行 所 勝 利 出 版 社

總 經 售 文 信 書 局

版 權 所 有

自序

我曾寫了幾本傳記。依出版的次序，第一是「西園寺公望傳」，當牠和讀者會見時，主人公尚是日本的元老，現在已入鬼籍。他應該是喜劇的角色，但我却連面容也沒有畫得像！第二本是「西鄉隆盛傳」。對這位日本「明治維新」的英雄，應該給悲劇的角色，但我文字表現却不夠生動！第三本是「加里波的傳」，我應該給這位意大利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者以一個喜劇式的描述，但似乎篇幅限制了我的筆鋒！第四本是「毛澤東評傳」，「先生」兩字是後來出版者加入的，我本想給他以一個喜劇兼悲劇的主角，爲着他是活生生的人，使我在不愉快的限制中，不能盡吐我所欲言。本書是第五本，但由於牠的主人公不配列入我所寫的傳記中，所以，抄襲他的作風，給與「正傳」的名稱。他的一生，既未曾演了喜劇，又未曾扮過悲劇，我爲什麼要寫牠呢？只一句話！「正傳」的寫作，本來是沒有大意義的。

當我準備這一工作時，曾加以考慮。世人——尤其是自稱爲「革命」或「前進」的青年們，給與死後魯迅的尊號，是「前進的中國思想家」，是「革命的青年導師」，是「革命的鬥士」，是「革命的文學家」。這些名稱，如假不曾嚇倒了若干人，至少是我，却被驚駭了。不錯，我已寫過若干人的傳記，但於所寫的角色，似乎都趕不上人們所魯迅先生。西園寺

公認不過是封建軍部所遺棄的政治家，和某一時期的自由主義的貴族——也僅此而已。像這樣的人物，是易於認識的。西鄉隆盛不過是封建時代日本的英雄，加里波的不過是偉大詩人，我總難着什麼一句話，不過是我們幼年時所知道的英雄而已。拿破崙是一個英雄，有了若干人爲他寫「本紀」或「傳」我雖不認那些「名士」，但我總可說一些英雄的行徑來。毛澤東先生是我們同時代的人，他的一切，我們不會生疏，寫他的歷史，似乎也不難；因爲，至多他也不過是一個時勢造成的「一時之雄」。但在那些人物中，有的是「革命者」，是「前進」，却沒有一個真像現在青年所尊稱之魯迅先生。就以馬克思爲例吧，他是一個够前進的革命者，思想深邃，但他却未曾寫一篇小說，因此，他不是文學家。那這似乎是說，魯迅先生要比前進的馬克思更前進，要比思想家的馬克思更有思想。像這麼一種的人物，正是我們懼慢之不暇，焉有勇氣去寫他的傳？

魯迅先生，這算是表面的想法。就以崇拜孔子爲例，儘管他是一般人心裏偉大中的最偉大者，而崇拜他的人們，也仍然有他的形容詞：「大哉孔子……」。於是，我以常人的孔子比魯迅，在當時我的下意識裏，有這一決心，若使我不能指示他的偉大，我學日本人贊美他爲「大魯迅」，說一句：「大哉魯迅」就夠了。

我本看這一決心，細心地閱讀「魯迅全集」。讀後，我的勇氣增加了。我的胆子更大了。因爲「全集」不僅爲我指示出，人們的排難和魯迅的本來價值不相稱，而且帶着若干政治

的目的，而且我居然發現，魯迅先生除了他的文學以外，別的什麼也沒有。如果說他是「革命者」，他卻躲在戰陣的後面；如果說他是「思想家」，他的腦子卻沒有思想的筋紋。但他究竟是否「青年的導師」，那我不明白，還要問他的受導者。我在同時又發現，這革命家的歷史，並不表示他的「前進」，只浮現曲折的活動。現在容我由他的歷史說起吧！

我把魯迅的一生分為下列各期：

第一期是他由呱呱墮地起至留日回來任學監止。這時期，他雖然曾加入章太炎的「光復會」但他並沒有具備該會同志徐錫麟的勇氣，只是像他在「阿Q正傳」及「吶喊」中的「假洋鬼子」。

第二期是由辛亥革命到被章士釗革職止的十四年北廷「僉事」。他在這時期，計任事過袁世凱，馮國璋，徐世昌，黎元洪，曹錕和段祺瑞六個或「大總統」或「執政」，此外還有一個「洪憲皇帝」。只有宣統他是公開反對的，所以，當「復辟」時，他憤然辭職，是否因為他的辦子留在東京，那非外人所知。他的直接長官——教育總長，使我列表統計，共二十七人，在這一大批「總長」中，有的是被魯迅先生罵為「無恥」的章士釗。他之離開教育部，不是由於他們的「大總統」或「執政」的人格有問題，更不是由於「總長」中有否如章士釗的「無恥」，是為着章氏革他的職。依陳西瑩敏授在當日「徐志摩」的信中所說，他被革後，憤憤然對人說「僉事」並不算區區」。也許為着這「不算區區」之官，所以，當另一個人

——以故宮古物案件而馳名的易培基接長教育部時，他再充當「僉事」。但這時候，周樹人的身和靈却已死亡了。如他在「吶喊」序文中所說的，魯迅却被陳獨秀，疑古玄同們，從「鐵屋」子內喊醒。

第三期是他被喊醒後，張口「吶喊」。這一期，他在文學史上曾留下一段永不能磨滅的記錄。我以「吶喊」中人物，寫成魯迅先生筆下之當時中國農村的景畫。他的「藥」，他的「社戲」，他的「風波」，他的「孔乙己」，是文學中的傑作，但他的把上述各人物大綜合的「阿Q正傳」，却有若干的失敗。這失敗——在文學觀點上——是必然的，可由他的「正傳」的成因」的敘述而得證明。我本來計劃寫一篇「唐，吉訶德與阿Q」，作為附錄，後來為着感覺魯迅比不上西萬提斯，阿Q也不能與「唐，吉訶德」相提並論，遂中止了。但我却對現在不斷提起「阿Q」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者的阿Q言論，給與一個適當的糾正。

第四期是由「吶喊」而「彷徨」，由「彷徨」而坐在「華蓋」之下，因之奔走廈門，廣州與上海之間的魯迅。為着他起來吶喊時，創造社已經在搖旗；又為着他要和她「聯合戰綫」時，創造社却「不准革命」——而且以成仿吾為「元帥」，李初梨為大將，馮乃超為先鋒、浩浩蕩蕩地加以「圍剿」。所以，他不能不一面抵抗，一面準備。準備的結果，是把五十歲的人抬入「唯物史觀」之門。有了她，他似乎就取得革命的身份證。

第五期是他加入「左聯」，並充當牠的領導者。但他的創作，却變為「什感」。在這時

期，他成爲中共的留聲機，也只有如此而已。可值得注意的，只有那教訓現今在延安廣場上紀念他的周揚和徐懋庸。這次「國防文學」與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」的爭論，不是有意義的論爭，只是爲爭正統，爲爭取「奴隸總管」的身份而內訌。結果，我們的「青年導師」，却被「惡劣」的青年徐懋庸送往天國去。

把上述五期中主人公的生活及主要作品，給與公平的檢討，是本書的任務。當然，我不是如一般寫抄「魯迅語錄」的「前進青年」，我只是記錄魯迅的生活。魯迅說：『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，因爲我覺得民國的來源，實在已經失傳了，雖然還只有十四年。』（「忽然想到」）我現在寫「魯迅正傳」，也爲着自他被「准革命」起，不過六七年，而魯迅的一切却大大地「失傳」，因此，我寫牠『給少年看』不是給「革命」的青年看。

本來我尙計劃寫魯迅先生的個性等等，但只寫了一半便告結束。我這樣做，是學魯迅先生的「阿Q正傳」的「大團圓」。我在想：我應做的事還多，不能夠爲只配寫一本『正傳』的人，花了更多的時間。也許若干魯迅主義者對牠會引起不平的回答，但這對我並不生什麼反感。我只認爲：我如能做到「凱撒的還凱撒」就夠了。而況我寫牠的目的，本就是教青年怎樣去認識魯迅。

目錄

- 一、假洋鬼子
 - 二、十四年餓殍
 - 三、吶喊
 - 四、阿Q正傳
 - 五、不准革命
 - 六、浪子之王
 - 七、革文學的命
 - 八、傳寶
- 附錄：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

一 假洋鬼子

本書主人公在蘇聯「文學曆」上，有細下的讚頌：「魯迅非但是一個成功的小說家，並且還是一個出衆的政治家。他把中華民族的全部最新歷史，都反映在他的雜文短論裏。他是爭取中國人民之民族的與社會解放的熱心戰士，他是中華民族反日統一戰綫的熱烈擁護者。魯迅是蘇聯真摯的朋友，他不倦不怠的擁護蘇聯。爲蘇聯辯護，駁斥資產階級與法西斯的謬謗。」看吧！一個小說家，能夠把一個民族的「全部最新歷史，都反映在他的雜文短論」，如果不說是奇蹟，那也值得讚美，而況他實是爲蘇聯從事「不倦」「不怠」的「擁護」與「辯護」的人？然而，這只算是受他擁護與辯護之外國人的觀點。

在中華民族領土湖南生長的手澤東先生，當紀念本書主人公時，以「中國共產黨」首領的身份，在延安的羣衆大會上說：「我們紀念他，不僅因爲他是好的作家和天賦的文學家，並且因爲他側身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前衛，把他全部的力量，貢獻給革命鬥爭。」這些話，既出自生長在中國人的口裏，那應該是可信了。爲着證明這些人們，本國的或外國的——的觀點，是否正確，需要從被歌頌者的全部生活的記錄中，找覓資料。換句話說：需要爲魯迅——本書忠實的傳記。

可是，依本書主人公在「阿Q正傳」中的告白：「傳的名目很繁多，列傳，自傳，內

傳、外傳、別傳、家傳、小傳。』又從他對牠們的解釋，寫「列傳」的人，是蘇聯的史官或成爲中國歷史諷刺劇的「蘇維埃中國」的史官；寫「內傳」與「外傳」的，是景宋女士和胡風先生們，筆者對他，只能寫一篇「本傳」。『但從我的文章着想，因爲文體卑下，是「引車賣漿者流」所用的話，所以不敢僭稱，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「閒話休題言歸正傳」這一句套話裏，取出「正傳」兩個字來，作爲名目。』（「阿Q正傳」）

無需說，我不是效法本書主人公，企望「鳴驚人地」，達到「人以文傳」的目的，我更不是，企望「文以人傳」，使我與被本書主人公有關係者與負有歌頌義務者所稱之「革命導師」一同名垂不朽。我一些也沒有這種念頭。我之寫「正傳」，也許會收到相反的成果。但，這應原諒我。我不是愛這位已死的「青年導師」兼「革命導師」太少，而是愛文學或真理太多的能力，說我所知道的，我所該說的。我認爲識別一個人的偉大，應從他的一生生活的分析着手。歷史上有恆河沙數似的史實，爲我們指示：被歌頌的與被侮辱的，有同一的不可靠。因此，我們欲認識超人，和我們欲認識禽獸，是用同一的方法。這恰和德國哲學家尼采在「蘇魯文語錄」中所說的一樣：

『人是一根索子，聯繫於禽獸與超人間。』

由這一前提出發，希望本書的閱者，在看完本書主人公的「正傳」後，再評判他是否「

超人國。似將並味為晚。自「自新」書白、「父勝長難書也。最難讀書，讀不人，讀以自

一而後出書及國也。

×

×

自「依本國主人公的」自傳「我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越縣的一家姓周的家裏。祖上世做「薛紹述」的，加個註釋「八月三日，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，名樹人字豫才，小名樟壽」。我們先同鄉頭看當周家添了一個少爺時，他的國家，究竟是怎麼樣子的。出於歷史告訴我們：「老天的帝國，變為次殖民地，是在一八四二年——清道光二十二年。這筆筆者執筆時問約近各個世紀。要南京條約，東縛後的中國，迅速地變換牠的面容，首先是利用該條約的開放商埠，其他「夷大」嘆喲「錢路神州」。接著是，內部週期性的農民暴動的爆發而並建立「太平天國」。到一八六四年洪秀全的革命火燄消失時，滿清的王朝已登上「三申的不平鎖鍊」。儘管頑固的執政者，還是抵抗新文化的侵入，却驚訝於「夷人」的堅甲利兵，不能不作若干的讓步。這些就是「一八六六年派知縣熾椿率同宜生遊歷外國，依左宗棠奏請在福建馬江設立工廠製造輪船；一八七三年設鐵路局；一八七六年准左宗棠借浮款一千萬兩，便學鴻章洗滌積習的奏請，選派福建前後學堂的學生三十名赴英法兩國學習機械製造工藝」。一八九〇年學鴻章奏請於陸路設立電綫。比例於這些在文化上的讓步，若干屬地或邊境也開始了天改變。這些就是：一八六七年法國收安南的柬埔寨為保護領地；一八六八年俄國收布哈拉汗為保護國；一八九三年法陷安南河內城，俄收塔什汗為保護國；一八

七六年俄滅浩罕國；一八七九年維新後的日本佔領琉球；一八八〇年法兵進駐安南順化府。以上的簡單記載，我們十分明白：周樹人時代的中國，已失了過去的尊榮，正像陳列於租界上的羔羊。藩籬開始盡撤，似賣身契的不平等條約也行將加多；但却有光明的一面，那就是新文化的侵入，可以腐蝕昏庸腐朽的滿清王朝。無需說，在這種環境中，當時的人們，自然會產生民族革命的思想，惟還難斷定應有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。誰能夠料想到，這以紹酒出名的縣城，會產生後日爲蘇聯「辯護」，並充當「無產階級革命」的「導師」呢？就是劉伯溫也缺乏這一本領。事實上，也並沒有這麼一種奇蹟。

若使說：上面引述的客觀情況，不足斷定生在那樣環境裏的人，應負着民族革命的任務；那却有充足的理由，下個斷語說：在那樣時代中，難於產生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者。因爲既沒有無產階級，（沒有近代的產業），也沒有無產階級的理論。（一八六七年「資本論」出版了，但還未和鴉片同時輸入。）

也許反對這論斷的人們會說：這是本書主人公降生以前的情況。時代既像洪流，怎麼能以前的條件，斷定他的後來呢？這論斷，似乎有他的理由。可惜，歷史愈演變，愈使人們明白：中國須走過民族獨立的道路！爲着明瞭牠，容我們再說本書主人公生產後的種種經歷——一直對他留學回國止。

周樹人先生的家世，依「自傳」的告白，「父親是讀書的。母親姓魯，鄉下人，她以自

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。」可是，他卻說，還有一位祖父，在北京（根據「年譜」）。母親給他的印象和影響，似乎比他的父親要大些。一八九六年，他六歲了。和當日一般的幼童一樣，他到私塾去啓蒙。他的教師是叔祖玉田先生。他有一個綽號——這是宗黨給他的——叫做「羊尾巴」，「譽其小而靈活。」他時常隨母親到安橋頭外祖母家遊玩。依「魯迅通」們的考證，他後日的小說材料，有若干是出自這地方。

一八九二年他十二歲了。改從壽鏡吾氏讀。依他的自白（可以說是回憶），他在這時對於二十四孝內的「老萊娛親」與「郭巨埋兒」，獨生反感。是否有這宗事，別人難於證實。但我們却否定他的可能。

一八九三年他十三歲了。依「年譜」：「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，自北京歸。」「秋，介孚公因事下獄，父伯宣公又抱重病，家產中落。」他在「自傳」中也說：「聽人說：在我幼少時候，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，並不愁生計。但我到十三歲時，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，幾乎什麼也沒有了；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，有時還爲乞食者。」他又在「吶喊」自序中說：「我有四年多，曾經常常——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貨舖和藥舖。」但我們却不明白這大變故，究竟是什麼。由「魯迅全集」找不出牠（註）。

（註）筆者有一位舊友——但現在爲着他是中共的黨員，或是立憲派的隊員，而彼此不通音問了。他也是紹興人。他爲着文化的工作，在上海曾和筆者有一次偶然談到魯迅

不單顧乎是爲魯迅募出版物的經費。他說：魯迅的父親（也許是他的祖父，我忘掉了）

（以家貧，常在考場內拾誓。有一次被覺入獄。周氏因之全家搬居杭州牢獄附近，至大鑊苑入死牢止，這友人的名字，寫着他速在新加坡（寫後知道又逃避他處了）及別的理由引中，暫不說出。

一八九六年，他十六歲了。因爲父伯宣卒（年三十七），他的境况，依「自傳」：「我漸至於極極少的經費也無法可想。我的母親便給我籌備一二點旅費，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，因爲我總不肯學做森或商人。」他又在「吶喊」自序中嘆一口氣：「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？我以為在這路途上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。」由於，人情總是景上落花，所以，他不能夠靠別人，而要靠自己。到一八九八年，他便「旅行到南京，致入水師學堂」。亦在機關裡。」（「自傳」）。但這學校的功課，却不是這位青年所欲學習的，所以，「大約過了半年」，他「又走出，改進礦路學堂，去學開礦。」（「自傳」）「年譜」的作着，爲他註釋一句話：「對於功課並不學習。」既然對於路礦的功課，也感不到興趣，爲什麼他要選這樣的學校？是爲着衣食呢？還是爲着別的呢？似乎，在這裏我們要對十六年來（也就是本書主人公呱呱墮地後十六年來）中國的狀況，加以論述。

當時同樹人氏往後兩年，香港已有被人們叫做「國大危」出現。儘管滿清的政府已不自覺地在接受西洋的文化，但她却不能表現能夠解除內在的危機與外患的侵襲。不僅支那已整

入法人之手（一八八三年），就是朝鮮，新起的日本也在垂涎。一八八四年法國的陸軍攻陷山，海軍攻台灣，這雖然引起翌年李鴻章編練「北洋水師」，但却無補於英滅緬甸。受這些重大刺激的後日中華民國創造者，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」，「但和者無幾。一八九四年，滿清政府被新起的日本帝國主義重創於朝鮮和遼天，而與中會就在這期間成立，到「馬關條約」簽字後，發生「廣州起義」。在這時候，不是一二人心裏懷着「革命」的大逆不道思想，牠却普遍地散佈於「有識之士」的腦中。但正似物理的規律，在另一方面，也產生了「反作用」——這就對已成歷史發展的事實而言——牠就是康梁的「公車上書」。此後，這兩個歷史的浪流——一個是推翻舊的建立新的革命，另一個是改革舊的弱點的維新——因甲午的戰敗，而泛濫全國。這個浪流，恰和當日滿清王朝派遣留學生的政策相呼應，便若干受西國文化及產業發展刺激的青年，分別地投奔於兩大陣壘。就在這一時期，我們的周樹人先生無形中受牠的影響。如果，他不想革命，如果他感覺維新，他總應有富國強兵的信念——如是他對這兩者一些也沒有，那他的知識水平要落在當日的青年的後面，只是爲嘯嘖而旅行於「水師」與「路礦」之間了。

究竟他當日究有何種的感覺——談不上「政見」，難得到正面的解答。因爲老於世故的他，對於自己的弱點和缺口的金人似的，從未會坦白地公開過。如果我們細心地在他的雜談中去覓證據，那只有這些話：「我生長在偏僻之區，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，只在飯店的招牌

上看見過。『滿漢酒席』字樣，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。』（一九三五年「病後餘談」）雖然他接着說：『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，是辯子。』但到知道『這辯子，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』時，是在他自稱『我有知識的時候』。這時期是否是入南京的「學堂」呢？也許是，也許不是。但無論如何，周樹人氏在青年期，並不和今日捧他的人們所誣捏似的，有什麼「超人」的銳感。他只是無數平凡青年的一個。這有什麼關係呢？依目前若干「前進者」看來，他的「偉大」不在於早年是否有分別「滿漢」的感覺，更不在於他能否選擇「革命」或「維新」做他政治活動的目標，只在於他後日能否聯蘇聯，和爲她的主持人「辯護」！

也許就爲着他不能夠區別「滿漢」所以一九〇一年末在路礦學堂畢業後兩月，被江南書院公所派赴日本留學。一九〇二年他到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首都。依「年譜」的記載，他先進「弘文學院」。這時候的東京，是革命黨與維新黨人才會聚的所在，他們的論爭，似乎引不起這二十二歲青年的注意。雖然他曾爲「浙江潮」什誌撰文（一九〇三年）並譯「月界旅行」，而還對於他後日的成名，並無關係。一九〇四年，他的祖父介孚卒（六十八歲），他自己也於當年八月進仙台醫學專門學校。爲什麼他要學醫呢？依「自傳」：「原因之一，是因爲我確知道新的醫學，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。」稍爲讀過明治維新史的人，對於已成名時（一九二五年）自傳者的自供，都瞠目不解。不錯，維新前本已有了醫學（他的詳細